

论道

上海,高颜值文化空间标示高品质生活追求

■ 蒯大中

近年来,上海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新型文化空间,成为城市文化肌理中最活跃的细胞。究其原因,一是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们精神文化需求持续增长,对文化产品、文化空间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二是城市建设由增量扩张转向存量发展,由大规模拆建和新建转向存量空间的有机改造和微更新,由此促成了城市空间属性与文化属性的融合;三是产业转型升级。同时,这也反映出了一个趋势,即人们一方面关注城市文化空间在功能上是否能满足人的文化生活需要,另一方面还越来越关注这些空间在美学上是否符合人们日渐提高的审美眼光。

上海城市文化空间的演化,已呈现出以下鲜明特征:

高品质:营造以人为尺度的空间

无论是空间营造也好,城市更新也好,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公共空间,归根结底是人们集聚、互动的场所。适应人的需求,满足人对空间的有效使用,是城市文化空间的核心要素,也是城市空间人性化的首要特征。所谓高品质文化空间,就是处处体现了“人的尺度”的空间。

过去的书店,营业员在柜台里,顾客在柜台外,想翻哪本书,必须由营业员拿给你。后来书店纷纷开架了,顾客可以自由地取书、翻书。而今天,西西弗书店、建投书局、大隐书局、钟书阁、衡山和集、思南书局等许多书店成了感觉和体验的空间,这里鲜花环绕,咖啡飘香,可以小坐,可以伏案,可以随意浏览图书,甚至可以听一场讲座,看一个小型展览,气氛自由轻松、温暖亲切,更像家里的客厅。原本单一的商业场景,变为综合的文化场景,更加人性化,更加符合人的需求。书店的变化,折射出城市文化空间演化的大趋势。

深入理解人们心里的真正需求,是城市文化空间营造的逻辑起点。浦东潍坊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设计师把基层文化中心视为“社区活力的容器”,在设计改造中尊重社区基本场所与文脉,从社区不同人群对文化中心的需求调研开始,并与社区创新专业工作组共同协作,一同调研和梳理出该社区人群对公共空间的使用模式和特征。中心改造后,便成为居民们十分喜爱的文化空间,从而荣获2019长三角公共文化空间创新大赛“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奖”。

设计感:提升空间美学品位

设计可以改变生活,设计可以创造价值。当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更加重视发挥文

化的作用和设计的价值。如今城市文化空间不但更加“好用”,而且更加“好看”,更加讲究“高颜值”、高品质,更加讲究空间设计,追求内外兼修,才貌双全。公共空间设计品质的整体提升,彰显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和审美品质。

荣获2019长三角公共文化空间创新大赛“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大奖的上海嘉定图书馆,在2013年就击败了美国纽约图书馆斯泰普顿分馆、墨西哥Jaime Garcia Terres纪念图书馆和加拿大康维尔社区图书馆,被美国权威设计杂志《Interior Design》评选为年度“全球最佳公共图书馆”。这座具有江南书院典雅风格的优美建筑,其外观平和低调,配以园林、竹瓦等江南本土元素,形成了空间的宁静感和亲切感,使阅读真正成为一种精神享受。

身处松江广富林文化遗址的朵云书院,其主体建筑竟是一栋整体搬迁而来的明代徽州木构建筑。建筑分上下两层,室内室外相连相融,室内设置了阅读、文创、展览、讲座、品茗等多个功能空间,室外设计了“松石境”与“水云乡”两个景观庭院,其意境与松江及其古称“云间”形神相契。朵云书院通过古建与现代设计的巧妙结合,为读者和游客提供了别样的文化体验。

设计除了追求美,还追求人与人之间情感的联系、思想的连接。空间人性化了,里面就会有一种能温暖人心的东西,这样的空间多了,就会使我们的城市真正成为有温度的城市。愚园路上的“故事商店”就是这样一个个有温度的文化空间。游客和市民可以在店内的“生活者”和“观察者”共创卡片上写下自己关于愚园路的故事与情感。这个不到10平方米的文化空间,吸引了不同年龄层社区居民的参与,最小的只有9岁,最长的有67岁。“故事商店”开出不到半年时间,就收集到了2000多则大家提供的故事。这样的空间真正嵌入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成为拉近人们距离的情感纽带。

◆适应人的需求,满足人对空间的有效使用,是城市文化空间的核心要素,也是城市空间人性化的首要特征。

◆如今城市文化空间更加讲究“高颜值”,更加讲究空间设计。公共空间设计品质的整体提升,彰显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和审美品质。

◆城市是多样文明要素的空间聚集,一个能够涵养、融合多样性的城市,多样性也会滋润、回馈这个城市。

◆守护地方文化特性的自觉意识正在觉醒,这种种努力正汇成一股坚韧的文化力量,在全球化时代坚守城市地方感和文化独特性。

◆城市文化空间的公共性,也体现在城市文化空间对于促进公共交往,推动公共参与,增强社会互信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上。

【核心观点】

开放性:激发多元文化活力

城市是多样文明要素的空间聚集,一个能够涵养、融合多样性的城市,多样性也会滋润、回馈这个城市。因此,空间开放度日益成为观察、衡量一个城市发展活力的重要维度。

上海博物馆里,法国凯布朗利博物馆藏太平洋艺术、十五世纪中期景德镇瓷器大展、唐招提寺摹真文物与东山魁夷扇展联袂登场;徐江艺术馆的“设计与生活系列展”上,上海本地的手作师傅带来了他们的蓑蓑、面人、剪纸、草编、藤椅、土布制品、生肖灯笼等手工作品;在中山公园,你可以驻足聆听上海长宁国际草地钢琴音乐节上国内外音乐家演奏的肖邦、贝多芬的钢琴曲;在静安雕塑公园,你可以尽情欣赏上海静安国际雕塑展展示的中外艺术家优秀作品……

已连续举办多年的上海城市草坪音乐会,既邀请世界一流艺术家和演出团体,又有上海交响乐团、上海昆剧团、上海民族乐团、苏州交响乐团等国内一流艺术院团的献演,集中展示了音乐会的高雅品质。

修葺一新的上海音乐厅,迎来了上海民族乐团的《木兰辞》《武汉十二锣》交响乐等艺术精品,同时又向手持荧光棒的“WOTA艺”年轻舞者敞开大门。上海大剧院、上海音乐厅、上海文化广场、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等艺术殿堂,无论在艺术家和表演团体的遴选上,还是在演出剧目和曲目的安排上,都显示了上海这座城市多元文化的气质和海纳百川的胸怀。

在地化:守护地方文化独特性

在全球化时代,地方性被日益消解。千城一面,千楼一面,是这种文化同质化潮流的真实写照。在国

际大都市的文化建设中,如何在本地化策略重建地方性文化空间,就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在当今城市文化空间营造过程中,成功的案例都是尊重在地的人文环境和历史文脉,注重地方历史文化符号的运用,强调自己的文化基因,通过地方改造和场所营造,让文化空间在同质化里凸显自身的独特性。

散布在黄浦江、苏州河两岸的大量工业文明遗迹,如今纷纷变身成为公共空间、艺术空间,呈现出后工业时代的特征。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徐汇滨江博物馆美术馆群、世博滨江美术馆博物馆群、苏州河畔M50创意园区、原浦东老白渡煤仓改造而成的艺术美术馆、亚洲最大的八万吨散粮筒仓改建而成的浦东筒仓艺术中心等,现在都已成为新的城市文化地标。

杨浦滨江拥有世界仅存的最大滨江工业带,这里曾是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如今六十多幢工业遗迹被一一保留下来,为城市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化记忆。昔日的“工业锈带”如今变为“生活秀带”“文化秀带”,具有工业区独特的场所感和艺术震撼力,现已成为众多市民打卡的热门地,同时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一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示范区名单。

那些以优秀历史建筑为载体的城市文化空间,更是以承继历史文脉为己任,处处透出浓浓的历史感,散发城市独特的人文气质。荣获2018上海公共文化空间创新大赛“公共阅读空间设计奖”“网络人气奖”两项第一名的杨浦区图书馆新馆,前身是民国时期“大上海计划”中的上海市立图书馆,由当时著名建筑大师董大酉主持设计。如今它重获新生,再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式复兴建筑”的历史特征与民族气派,吸引读书人近悦远来。

上海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愚园路武夷路和新华路等历史文化风貌街区,在挖掘和保留历史人文特色的同时,赋予其文化服务功能,涌现出书店、画廊、公共市集等一批文化空间;亚洲文化大楼

改建的上海外滩美术馆和跑马厅总会改建的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成为城市文化空间更新的典范之作;浦东沿黄浦江20多公里岸线分布的“望江驿”文化驿站,为滨水空间注入文化内涵;金山区挖掘乡土民间习俗、传统美味、乡俗活动、儿时游戏等各类文化记忆,利用古建筑、工业遗址等营造文化体验空间;松江区“泗泾镇非遗传习基地”,围绕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多样文化空间……

守护地方文化特性的自觉意识正在觉醒,这种种努力正汇成一股坚韧的文化力量,在全球化时代坚守城市地方感和文化独特性。

公共性:体现空间公共精神

公共性是城市文化空间的灵魂。城市文化空间的公共性,不仅体现在空间的开放度上,同时也体现在城市文化空间对于促进公共交往,推动公共参与,增强社会互信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上。

公共空间的价值,就在于它能促进城市中不同社会群体的人们进行交流、融合。荣获2019长三角公共文化空间创新大赛“基层文化空间优秀案例奖”的“鞍山四村第三小区百草园”,以社区花园为公共空间更新实验基地,从孩子的自然教育和自然种植入手,积极推动参与式设计营造,吸引社区组织参与公共空间的推广与探索。这个项目的设计团队从设计之初就吸引居民高度参与,请居民谈设想,提建议。在整个施工过程中,也有意识地让居民们参与其中。这样就融入了社区成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整个设计营造过程成为一个社区动员、社区合作、多元共治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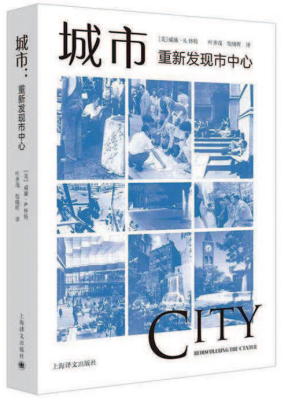
新华路669弄是上海常见的典型老房小区。由于公共空间严重缺乏,小区门口狭长的门卫室成了小区的社交中心,小区居民都喜欢聚在那里唱歌、聊天。为了满足小区居民的需求,经过设计师、社区居民和社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把这个拥挤局促的空间,改造为精美的“睦邻微空间”,成为社区居民喜欢的分享书籍、交换旧物,交流情感的公共文化空间。

人们住在一起并不会自动成为社区,社区的真正形成离不开社区居民之间的社会交往和互动。城市文化空间不仅丰富了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还大大加强了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交流和合作,增加了相互的信任,成为社区凝聚力和社区归属感的形成基础。在许多地方,文化空间已成为大家离不开的文化之家。

城市公共空间作为城市肌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整体环境中具有核心地位。城市文化空间的不断丰富、提升,是我国城市建设和文化建设迈向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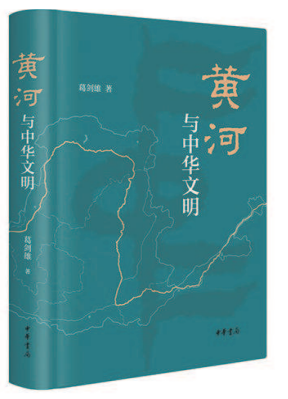
(作者为国家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社科院研究员)

荐读



《城市:重新发现市中心》([美]威廉·H.怀特著,叶齐茂、倪晓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10月)

本书是作者2016年直接的和持续地观察城市公共空间的结晶。怀特使用录像机,记录下城市中心地区的广场、街道、小公园和市场里人的行为,然后再做具体分析,从整体上评估城市中心的健康。



《黄河与中华文明》(葛剑雄著,中华书局,2020年10月)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自古以来,黄河安澜就是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欣欣向荣的保证和象征。那么,为什么说黄河是母亲河呢?她和中华民族有怎样的关系,如何孕育出辉煌的文明,她的独特面貌是如何形成的,又应该如何治理呢?本书即讨论、阐述了这些问题。



《生老病死的生意》(陈纯菁著,魏海涛、符隆文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

作者通过在上海等地进行的深入细致的民族志访谈,记录了中国人寿保险市场在避谈死亡的文化禁忌下的发展历程及其背后的微观政治。书中提出的“文化多重互动模型”,对市场起源进行了具体而微的文化解释,呈现了作为共享价值的文化和作为工具箱的文化的精彩交互。

锐见|行业研究

互联网+支付:监管难题如何解

■ 胥莉

对互联网+支付企业的监管,是互联网整合支付后,未来数字化生态圈的发展对监管提出的新挑战。

随着支付行业快速发展,中国已具有全球领先的移动支付市场。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第二季度末,我国银行卡联网的特约商户已超2500万家,银行卡累计发卡数量达到86.58亿张。但是,目前大多数银行卡都绑定在微信或支付宝等支付账户上,支付账户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成为商业发展的基础工具,从根本上改变了商业的逻辑,改变了企业的商业形态和模式,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根据我们对2011-2016年银行卡交易的研究,在小额高频交易场景,银行卡逐渐被移动支付替代,“扫一扫”已经成为小额高频场景下的主流支付方式。截至2019年,

微信和支付宝占移动支付的市场份额达到95%。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开始收购支付牌照,2018年拼多多多收购支付牌照,2020年字节跳动、携程先后收购了支付牌照,互联网+支付的支付机构占据了移动支付市场的主要份额。

但是,支付本身并不能独立存在,它深度内嵌于场景,无场景则无支付。同时,由于互联网企业掌握了最核心入口的用户画像,易于向生态圈其他企业赋能,不断提升生态系统数字化水平。这个数字化的过程不仅降低了不对称信息带来的交易成本,还提升了整个产业生态圈的边际收益。其次,C端巨头以强大的C端流量加剧了B端数字化升级服务市场的竞争,不断提升B端市场的数字化程度。随着支付机构场景化的建设和发展,支付机构不仅是支付,他们与电商、旅游、零售、餐饮等等所有的场景交织在一起,推动着支付生态SaaS化(软件即服务Software-as-a-Service),带动了民生领域和实体经济的数字

化发展。问题和挑战也由此产生。全球没有一个国家有互联网+支付账户的企业,更没有针对互联网+支付账户企业的监管。在中国,互联网企业加了钱包,钱包+通道,在算法的支持下,企业具有很强的纵向、横向扩张能力。场景数据优势可以降低融资成本,使得互联网+支付的企业进入金融领域非常容易。在互联网与金融未设防火墙的情况下,这给监管带来了新挑战。另一方面,如果拥有钱包的企业或者拥有账户数据的企业,特别是生态圈的其他企业,排他性的使用数据,那么对于整个经济发展、市场竞争都非常不利。

未来,对互联网+支付企业的监管,不仅仅是互联网监管问题,也不是互联网简单加支付的监管问题,而是互联网整合支付后,未来数字化生态圈的发展对监管提出的新挑战。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数据资本: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 许志伟

数据资本影响企业的生产行为,其本质是内生增长,其核心机制是非竞争性规模效应。

数据作为一种核心生产要素,正对经济行为和经济增长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显示,我国2019年数字经济体量是30多万亿元人民币,占GDP比重约30%。从数据影响生产行为来看,它究竟如何促进我国当前经济增长呢?

首先,数据资本影响企业的生产行为,其背后复杂的数学理论简化来说,就是数据会生成知识,形成直接用来指导生产行为的信息,从而促进生产率,影响生产过程。其本质是内生增长,其核心机制是非竞争性规模效应。比如,不同的单车企业有自己的用户数据,这些数据共享可以形成算法精确度的优化,改善服务质量。

数据经济的优势还体现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上。如果银行面对一群质量差异很大的企业,但又无法识别,那么银行就会统一设定严格的信贷标准,最终导致好企业也难借到钱。但是,足够多的企业动态数据可以帮助银行有效鉴别出差的企业。当企业借款者平均质量高,银行就可以设定一个较低的信贷标准,从而降低了优质企业融资成本。

数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那么那么大,那市场本身是否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数据资产呢?

理论上说,数据产权归不同人所有会产生不同类型的市场均衡,这些市场均衡会因为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比如,企业拥有数据资产,那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企业作为消费行为数据的使用者,可能会只关注利润最大化而过度使用数据,第二种情况是消费者即数据供给者,由于担心隐私泄露等问题,没有足够动力提供数据,从而导致供给不足。

此时,政府作为数据拥有者,可

以通过权衡效率与隐私,优化数据资产的配置。政府还可以构建数据平台,有效解决企业出于竞争考量,数据供给不足的问题。比如,国家统计局每年对规模以上企业进行调查,构建了工业企业数据库。这一数据库非常成功,学者基于此进行很多研究。这些科学研究结果再反馈给微观经济决策者,帮助他们促进生产。当然,政府作为数据监管者同样很重要。因为强化数据监管,强化隐私的保护制度能够改善外部性导致的数据资产市场失灵问题。

数据资本能够促进生产,促进经济增长,但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体现在中国的两个比较优势。首先,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市场,意味着各类经济行为规模巨大,能够生成超大规模数据。其次,强有力的政府有助于更好地积累数据资本,除了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还能为数据资本的创造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但挑战同样很多。比如,数据的安全性。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